

从“骑手”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新趋势

□ 张 放 厉基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报告还强调要“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农民工群体基数大、流动范围广,是我国重点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至今,农民工群体已实现了代际更替,大多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经验,他们受现代文明影响更深、更向往城市生活,对就业有更高的职业期待。但是面对现代产业对专业化技能要求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又相对滞后,因此在传统就业市场上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为了实现更好就业,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以网约配送员(以下简称“骑手”)为代表的 new 就业形态,以期实现资本与技能的积累。骑手工作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能就业”“好就业”的同时,也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求的新趋势、新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呈现出新的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他们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也有着更高的职业期待。与老一代农民工大量在建筑业、制造业“打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领域、工作模式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是就业领域从传统行业拓展到新兴行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创新驱动、服务引领、制造升级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比如2020年北京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伴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活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美团研究院调研显示,美团平台上约八成骑手是农民工,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生代农民工。

二是择业目标从“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选择时不再只看重薪资待遇,而是会从工作环境、职业上升空间、个人喜好、行业前景等多个维度进行考量,不希望再从事那些简单机械、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且收入不稳定的工作,并有强烈的提升劳动技能的意愿。“创业意愿强”是新生代农民工就

业观念转变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在从事骑手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超过1/3有创业的想法。

三是工作状态从固定化转向灵活化。新生代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上停留的时间明显缩短。据2011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的《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报告显示,2004年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上平均停留的时间大约为4.3年,2008年仍超过2年。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态调查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农民工中,仅有极少数的人会在一份工作上坚持2个月以上,换3至5次工作的占4成以上,换6至10次工作的占比达35.4%。

新生代农民工在传统就业市场面临困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城镇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持续低于城镇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总体来看,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要找到一份工作并不难。但他们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却很难。现代产业的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又难以匹配现代产业的用工需求,导致他们在传统就业市场上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

一是职业技能水平与心仪的工作不匹配。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的意愿从事技能要求高的工作,但他们所拥有的职业技能却难以匹配相关岗位的用工需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工作中,27%的工作对数字化相关的技能存在需求,但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仅有9%具备一定的数字化技能。

二是接受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程 度相对不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研究表明,在更年轻化的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中等教育(高中/中专)的占比达80%,较上一代农民工显著提高;但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仅有4.4%,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低超过10.2个百分点;4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

三是年龄优势正在减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逐年提高,2021年已达41.7岁,40岁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51.8%。而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普遍对年龄有一定要求。比如《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



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67.2%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就业。美团研究院的调研显示,美团平台上有超过三成的骑手在成为骑手前处于待业状态,年龄越大,待业期越长。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其就业竞争力会进一步减弱。

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就业”“好就业”

由于在传统劳动力市场上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投身以骑手工作为代表的 new 就业形态。骑手工作能够帮助他们稳定收入预期、实现职业生涯的过渡、提升资本与技能的积累。

骑手工作帮助劳动者实现充分就业。骑手工作入门门槛较低、包容性强,能够为就业困难的劳动者提供兜底性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充分就业。部分从事骑手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人力资本积累及明确的职业规划,在较长的时间内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因此需要一份相对低门槛的工作来获取收入、维持生活。

骑手工作能够帮助劳动者获得“可预期”的收入。很多骑手在进入美团平台前所从事的工作都面临着收入波动较大、不可控等问题,其中超七成的新生代农民工骑手存在负债问题,因而他们对收入的稳定性有较大的需求。骑手工作“按单计价、多劳多得”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劳动者提升收入的“可控性”。

骑手工作能够帮助劳动者实现职业生涯的过渡。骑手工作自由进出、自主接单的特点,能够帮助劳动者在职业生涯的过渡期维持收入,并为未来发展积累资本。调研显示,约三成的新生代农民工骑手将骑手工作作为一种“过渡性”选择。骑手工作既可以帮助他们应对收入的中断或暂时性

下降,也能帮助有创业计划的劳动者积累创业启动资金。在做骑手工作的过程中,劳动者也能够增进与城市社会的互动,从而促进沟通、交流等通用技能的提升。

骑手工作帮助劳动者以兼职或众包的形式增加收入。新生代农民工骑手中,约七成成为兼职骑手或自主选择接单和配送任务的众包骑手。在原工作岗位上出现收入下降或工作不饱和等情况时,这些劳动者便通过兼职做骑手来弥补收入的不足。外卖订单旺季与制造业等行业用工旺季的差异也能够让劳动者“错峰”从业。通常来看,外卖订单旺季在暑期,而制造业的招工和订单旺季则集中在春秋两季。

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打造成普惠性强的民生工程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仍存在一定压力。为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更好就业,要充分考虑该群体的人力资本状况,在鼓励各类经济主体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要着力提升此类群体的职业技能。建议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优势,通过匹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为劳动者提供多元化的就业选择,并创造大量新岗位、新职业。同时,逐步推广校企合作、工学一体化、“互联网+职业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在政府统筹管理下,团体开展职业技能教育的积极性,扩大培训供给,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打造成普惠性强的民生工程。



(上接1版)

中国贸促会涉外法律业务积淀厚重,多年来在国际经贸仲裁、知识产权服务、商事调解、经贸摩擦应对、企业合规管理等领域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完善涉外法律法规、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加强国际法治合作等工作成效显著。我们将认真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完善商事法律公共服务体系,高标准筹办全球工商法治大会,提高国际经贸仲裁和商事调解公信力,支持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拓展企业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撑平台功能,帮助企业掌握政策、防范风险、处置纠纷,把涉外法治保障和服务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当好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宣传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要求我们坚持自信自强、用心用情,主动担当外交使命,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中国贸促会一直是民间友好往来的重要使者,通过多种途径推动中外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从1982年首次代表我国登上世博会舞台以来,组织中国馆在海外参展16次,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北京世园会,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日益开放和精彩绚丽的中国。2022年,中国贸促会打造全媒体传播格局,按月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持续发出中国工商界之声,讲好中国开放故事,传递中国发展信

心,不断扩大知华友华助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国际传播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实效性不断增强。

顺应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形势,我们将把贸促工作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特点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继续发挥世博会中国馆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作用,做好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参展工作,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用好各类工商合作平台,办好例行新闻发布会,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广泛宣传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推进高水平应用型智库建设,深化与各国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商协会和智库等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世界大事、全球性话题讨论,让全世界更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为我国发展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当好深化对外经贸关系的担当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我们必须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我国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与共建国家贸易和投资规模稳步扩大,一批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

持续提升。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贸协定,与自贸伙伴贸易额占外贸总额达35%,特别是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建成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中国不断以自身新发展为各国提供新机遇,为动荡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中国贸促会将始终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发挥开放窗口和桥梁纽带作用,助力全球工商界抢抓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通过举办各类展会、论坛等,加大政策宣介力度,提升经贸合作水平,办好“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促进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帮助企业用好用足自贸协定政策红利。突出民间外交“润滑剂”和经贸合作“压舱石”作用,办好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做实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点,推动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当好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参与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角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同外部世界关系,鲜明提出并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还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和实现路径,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供一个又一个重要公共产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从亚太经合组织到二十国集团,从金砖国家到上合组织,我国接连举办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在多边舞台掀起一阵又一阵“中国风”,引导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推动多边合作日益深入。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工商界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制定者和积极实践者,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行动者。中国贸促会将坚持胸怀天下、树立世界眼光、提高战略思维,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广泛凝聚工商界共识,共同推动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深入参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培养和推荐更多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或工作,在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加强分析研判并提出务实建议,推动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作者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党组书记、会长)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指出,“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毋庸置疑,数字数据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黄金资源。然而,数字政务在社会治理实际应用中,目前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数字化转型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在推进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治理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同时,对政府运行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等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推进政府运行方式和治理模式的数字化、智能化,以数据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推动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进程。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正掀起新一轮数字政务建设热潮,面对数字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在实际治理推进中依然面临一些问题。

数字政务建设标准设定难。近年来,全国各地区相继出台了数字政务建设的规划或行动计划。但是,数字政务建设的标准设定问题始终存在,一些城市关于数字政务的顶层设计较为宏观,各部门在数字政务建设中又是“各自为政”,主要表现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系统平台重复开发,带来了数字政务建设中数字场景的碎片化和数字资源的浪费等问题,导致各城市间数据在省域层面无法互联互通。

数字政务建设人才招引难。数字政务建设同时涉及计算机、管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因而建设数字政务要求拥有跨界思维的通用型复合人才。一些城市数字政务建设的“人才荒”现象已经显现,由于缺少相应专业技术人才,政府的数字政务系统不得不全权委托相关企业负责开发设计,不仅极易产生数字政务建设话语权“旁落”的风险,而且可能出现设计的系统难以符合实际要求,为后续数字政务系统投入运行埋下“隐患”。

数字政务数据开放共享难。数字政务建设的基础是“数据”,而数据只有在省市域层面和部门系统之间畅通无阻,才能得以有效运转。一方面,市级层面之间数据联通仍有困难。数据碎片化、非结构化现象问题突出,进行技术整合的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数据监督管理难度较大。不同部门系统多头管理致使工作人员重复劳动、疲于应对,各类数据统计口径不一、底数不清,数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

数字政务数据安全保障难。数据安全问题具有保密性低、完整性低、可用性低、可控性低、可审查性低等特点,加之政务数据共享开放环节复杂、数据流动频繁,过程中潜藏了诸多数据泄露风险,政务数据安全防护面临巨大安全挑战。随着各大城市加快推进数字政务建设,在给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夹带了数据安全隐患问题。

推进社会治理数字政务高效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找准问题症结“对症下药”,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治理效能的新期待。

统一数字政务建设标准。数字政务建设与其他项目建设不同,顶层规划设计不科学必然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只有坚持顶层设计先行,统一数字政务建设标准,才能引导和规范各地数字政务建设。一方面,根据《规划》要求,围绕2023年—2025年每年数字政务建设目标,在顶层设计上,先行研制一批数字政务标准规范投入实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制定多元基础性标准。在消化吸收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制定数字政务标准的经验,并充分进行科学论证,制定符合本地特色的标准。

探索数字人才培养模式。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人才储备,需要启动数字政务“人才培养计划”和“政数学院建设”两项工作,构建一支结构科学、素质过硬、持续发展的数字化人才资源队伍建设。首先,招引一批数字人才。量身定制数字化人才招引实施办法,支持企业高薪聘请数字化人才和团队,鼓励数字化专业优秀毕业生和团队就业创业。其次,选派一批数字人才。通过遴选一批数字化相关专业的公务员,选送到省大数据局跟班

□ 于 江

对症施策 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高效协同 数字政务

学习并同省内外先进地区进行交流。最后,培养一批数字人才。探索成立“政数学院”,依托政数学院加大对公务员和从事数字行业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数字人才队伍。

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在数字政府建设中,要提高数字服务水平,需要在制约数据治理能力方面寻找突破。一是多方引入大数据。数字政务建设中的数据资源可尝试引入企业、社会及行业等第三方数据,充实政府数据资源库,融合第三方数据与政务数据,实现多方数据共享。二是强化数据汇聚整合。数据汇聚整合要在“量”和“质”两个维度同时发力。“量”是强调数据的覆盖面,要求将数据“一网打尽”。“质”是强调数据的有效性,要求数据真实准确、精细分类。三是建强数据交换平台。以政府为主导,打造数据“交换超市”,强化市域范围内的数据交换、共享互认,完成“市内通办”所有事项,确保市级部门间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的数据“即时共享”。

保障政务数据安全可靠。数据安全是数字政务的“生命线”。首先,要制定数据安全保障细则。各地区要根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数据安全保障条例,细化数字政务中的云、网、平台、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制度。其次,加强网络安全专项检查。明确数据安全检查机构,组织在重要时间节点和常态化开展数据安全督查检查和问题整改,实现数据系统检查“全网覆盖”,检查考核对象“全域覆盖”。最后,保护政务数据个人信息。政务数据存储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数字政务升级后必将大量使用人脸识别、机器视觉等AI智能功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要制定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标准,建立政务数据安全自监管体系给个人信息上“锁”,为建设数字政务构筑安全“堤坝”。

